

祝勇  
——  
著

最后的

皇朝

The  
Last  
Dynasty

革命前夜的大清王朝



最后的

皇朝

The  
Last  
Dynasty

革命前夜的大清王朝

祝勇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皇朝：革命前夜的大清王朝 / 祝勇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  
2017

ISBN 978-7-02-013444-1

I. ①最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1480 号

责任编辑 赵萍 薛子俊

装帧设计 崔欣晔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4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125

印 数 1—15000

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44-1

定 价 7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那些平时依序和并列发生的事，都压缩在一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。

——〔奥地利〕茨威格

新版序



今夜，翻读这部书稿，我仍被自己多年前的文字带入到一种无限苍茫的历史情境中。好似一些故人，在某一次回忆中如约而返。照片和文字里的他们，一如我们身边的人一样真实和生动。说他们栩栩如生，那是因为他们生过，所以他们仍然可与我们说话、交流，在照片或者文字里，跨越了百年光阴。但我知道，在照片之外，我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时间，有着全然不同的际遇与命途。

然而，我要说的却是，生于同一时代的他们，际遇与命途竟也全然不同，甚至于为了各自的抱负而拼杀个你死我活。时代让他们离得无限近，政治却把他们推得无限远。之前的历史中，似乎还没有一个时代，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咫尺天涯，让我恍然：这到底是戏，还是历史？

最典型的例子，当属良弼与吴禄贞，两位留学日本的同窗，

那个年代里的青年精英，一个试图挽大厦之将倾，一个却要为皇朝釜底抽薪，结局是后者（身为革命党的帝国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）被刺身死，而前者（身为保皇党的良弼）同样没有逃出被暗杀的宿命（详见第五章《车站》），只不过这暗杀的意义与影响，截然不同——良弼是为将死的帝国殉葬，吴禄贞则为新生民国而牺牲。假若吴禄贞没有在军队政变的前夜意外死亡，他率领的北方新军（革命军）就可能直捣紫禁城，南北战争和南北和谈或许就不会发生，后来的历史，或许就轮不到袁世凯发言。

我不想谈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，我只想说，在那个时代，每个人都在试图创造历史，也都在被历史裹挟着前行。因此，在每个人的小命运之上，都有着无法摆脱的大命运。一如我在本书初版序言里所说的，本书意在剖析中华四千年帝制（自夏朝以来）何以在辛亥年猝死，同时也有兴趣解剖在这宏大的历史叙事下一些鲜活的小麻雀，这些小麻雀的名字是：载沣、载涛、端方、杨度、梁启超、汪精卫……

## 二

本书原名《辛亥年》，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，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出版六年来，我对原稿进行



了较大幅度的补充修改，虽写作的立意与方法未改，然而此番改名《最后的皇朝》，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侧重点还是有所调整。

当年取名《辛亥年》，选取年代剖面式的写作，自然有黄仁宇先生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影子。而此次改名《最后的皇朝》，则把焦点转移到人的身上——帝国大船倾覆的时刻，船上乘客的反应与抉择，借此凸显我观察那场革命的不同视角，那就是把被革命者——帝国皇亲国戚、朝廷百官，当作观察与书写的对象，从他们的命运里，解读历史的大命运。

中国历史上，发生过许多次改朝换代，出现过无数位的末代皇帝，但皇权未死，下了台的皇帝，换了一个姓氏又会卷土重来。唯有清朝不同，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皇朝，清朝的末代皇帝，不只代表着清朝的终结，也代表着中国四千年帝制的终结。中国人从此与皇帝永别，再也没有回头。其坚决，也超乎想象，当然也超出了企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的想象（详见拙著《民国的忧伤》），也证明了我们民族是一个能够自我调适、再造文明的开放性民族。站在这一视角上解读历史，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。此书或许未能达到所期，那是我的视野与能力所限，而非所选视角之误。

### 三

2011年，当我的《辛亥年》一书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、我任总撰稿的十集纪录片《辛亥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时候，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成立一周年之际，举办了“辛亥革命与故宫博物院建院学术研讨会”，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、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六周年，说明了清宫与辛亥革命的独特关系，而故宫博物院之建立（由帝王的皇宫转型为公众的博物院），也最典型地体现了辛亥革命之成果。

有意思的是，此书出版后不久，也是“辛亥革命与故宫博物院建院学术研讨会”之后不久，我就收到了故宫博物院的一纸调令，正式调入故宫学研究所。而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，还断无此念。我与故宫博物院的缘分，固非一本书所成就，而是早有渊源，但对革命中的“最后的皇朝”的研究与书写，却为我与这座旧日皇宫的联系加入了某种戏剧性的元素。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，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，甚至在一百年后，仍然能够改变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的道路。

### 四

宇文所安先生在谈到自己著作时说：“如果能够重写，它们

一定会不一样。无论是我个人,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,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”<sup>[1]</sup>我想,每一个著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因此,在初版之后,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本书的修订,以补入最新资料。经过几年的蜕变,终成为今天的《最后的皇朝》。它脱胎于《辛亥年》,但不只是《辛亥年》的再版。

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、同事对我的大力支持,感谢老朋友臧永清、应红为此书乃至我的整个作品系列出版而做的努力,感谢赵萍、薛子俊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,感谢刘静、崔欣晔老师为此书所做的设计,没有他们,此书不可能以今天的面貌呈现给读者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be '王立群' (Wang Lijun),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.

原版序



辛亥年到来的时候，没有迹象表明，这将是这个铁血帝国的最后一年。这一年，是从隆裕皇太后万寿圣节（正月初十）的歌舞升平开始的，而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十二月二十五日（公元1912年2月12日），隆裕却颁布了一纸退位诏书，中国的封建政权就此曲终人散。历史的急转直下，在当时绝大多数人（包括革命领袖）看来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因为这一年，如同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开篇所说，“当日四海升平，全年并无大事可叙”。对于帝国来说，最危急的时刻（庚子事变）已经过去，随着慈禧太后在遥远的中国西部挥动巨手，大清帝国“春天的故事”业已唱响。至辛亥年，政治体制改革已向深水区挺进，在中央的号召下，各地议会（咨议局）已纷纷成立，尽管朝廷制订了立宪期限，但国会（资政院）建立已经不可逆转，只是时间问题，以梁启超、杨度、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已经沉浸在成功之前的兴奋中；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已卓有成效，具有

近代意义的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》《大清新刑律》《民律草案》（尚未颁布）等纷纷制订完成；铁路、煤矿、公司、股市、律师、国有企业、合资公司……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资本主义事业在封建主义的皮囊内部高歌猛进；军事方面，一支参照世界先进水准打造的新建陆军已经形成战斗力……所以，这一年纵然灾异不断——如本书开篇所讲，却符合黄仁宇所说：“以我国幅员之大，似乎年年在所不免。”起义不断（如著名的黄花岗起义），也大多是昙花一现，规模影响远不及当年的太平天国，因此，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说：“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，也就无关宏旨。”从积极的方面看，帝国已经从死亡的边缘缓过一口气，进入复苏和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。

但是这个自信的帝国正是在“我们一点点好起来”的形势下猝死的。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十余次起义未能撼动它的根基，来自武昌的一次“计划外”起义却将它送进坟墓。仿佛一个巨人，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。辛亥年的故事，在今天听起来仍然很像是一个传说，这是历史本身的张力，后世作家不需要太花心力，只需如实描画出它的大致形象，戏剧性就自然显现了。有人说，革命不是产生于最黑暗的年代，而是压迫稍微放松的年代，是对于黑暗的一种滞后反应。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一条定律，至少在辛亥年，它是适用的。

帝国的悲剧，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，埋伏在它的自我标榜与自我迷恋里，埋伏在它万世不朽的期许与谎言里。大清帝国不是没有危机，否则它的猝死就变得不可解释，而天下的一切命运，都是可以解释的。提供作者自己的解释，正是本书的旨趣所在。

从消极的方面看，即使在万寿圣节的歌舞升平中，在它自认为“一点点好起来”的形势下，帝国的警报也没有撤除，只是当权者对其充耳不闻而已——当权者只能听见他们想听的话，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物，所以在他们眼中，永远都是天下太平。所以，辛亥年在统治者、立宪派和革命党眼中，形象截然不同，甚至有天壤之别——他们拥挤在一个相同的辛亥年里，但每个人、每个阶层、每个政治派别，又都有自己的辛亥年，也就是说，在一个辛亥年中，包含着无数个辛亥年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年，辛亥年也不应是一个单纯的纪年，在它的内部，至少包含了自鸦片战争至 20 世纪中叶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百年的历史——作为最早关注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官员，林则徐在他编著的《四洲志》里，就介绍了西方的议会组织、权力关系、选举制度等，与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、徐继畲的《瀛寰志略》等著述一起，共同构筑了 1840 年代中国人的民主梦想；辛亥革命的成功所带来的系列议会实验，因



1949年国民党败走大陆而告一段落，这一政权灭亡的轨迹，几乎与本书所描述的大清帝国的沦落过程如出一辙，辛亥年既包含了对过去的专制历史的总结，也包含着对未来各种类型的专制梦想的预演，这使我们对辛亥这一年的丰富性刮目相看，所以这一年，不是一个闭合的时段，而是一个开放的时段。

从大历史的观点看，晚清研究和民国研究，与辛亥革命研究是相互渗透的，无法一刀两断。如同一位朋友在读了我的长篇小说《血朝廷》以后给我的信中所写：“革命只是爆炸前的火光一闪，而黑屋子早就蓄势待发半个世纪了，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，是时势的风云际会选择了革命的人和事。必然有一人要去引燃这巨大的帝国的毁灭，这样的人、事便是历史的精魂所在。有必然有偶然，在这样的意义上纪念辛亥革命，庶几贴近历史本意。”尽管黄仁宇说，“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，也就无关宏旨”，但在此时的帝国形势，却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酿成大灾。帝国累积的种种矛盾，及其被这些矛盾所左右的命运，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内容。

辛亥年线索之庞杂，矛盾之纷繁，无疑使写作具有了难度。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出哪一年能像这个年份那样，有着超大的历史容量，纠集了那么多的转折、浮沉、悲喜、恩怨、可能和不可能，在这三百多个日夜里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，都